

编者按

出版业改革开放的40年,是从事业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过程,是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指令性内容生产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文化体制的特殊属性,让出版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更多的难题,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从切片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观测到在大宏观背景下,出版业所做的创新探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对30个出版切片进行盘点,改革开放迎来40年之际,我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对近10年的观察,推出了40年40切片。这些切片让我们更加清楚,出版业市

场竞争能力的增强来源于出版企业内部包括编辑室建立、稿酬制度使用、竞聘上岗等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来源于通过集团化、资本化的方式实现“弯道超车”,迅速完成“大出版”产业链的搭建;来源于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赋能出版,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继而进入“互联网+”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小”,分工明确,特色化、精细化经营体系更加完善;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大”,体量变大,数量变大,功能变广,出版机构已然从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文化服务提供商,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新型合作层出不穷。这正是出版的魅力所在。

1978~2018 书业变迁40切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丽萍/整理

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出版机构的重生或者新生。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元老级”出版社在经历了“文革”的彷徨苦涩后,迎来了复办。而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同龄社”则在百废待兴、全国动员的呼声下迎来了新生。可以说,1980年代~1990年代,是出版机构试水建制的摸索期。出版业逐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图书稿酬制度,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书号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等。尽管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出版单位已经率先有了市场意识,开始自办发行。1992年,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很多出版社纷纷进行体制创新,改变“大锅饭”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了“东山会议”,建立了业绩和分配挂钩的提成机制,提高了编辑的积极性。出版机构抱团取暖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萌生,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体、美术社联合体出现,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民营图书公司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出版品牌,如世纪金榜、世纪天鸿、金星书业等。

2001年,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教材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都可以参与竞争中小学教材编写。同年,国务院也提出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教材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活力也随之增强。除此之外,2000年初,出版机构的精细化经营意识逐步增强,根据不同产品特征细分了不同的编辑部门,甚至成立了营销部、策划部等适应市场的功能性部门。在国际出版方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快速增长,国际合作步伐加快。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期后,转企改制进程加快。2005年,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制定,当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并同步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制改革。短短3年,2008年50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和20多家高校出版社先后完成改制工作,2009年转企改制继续发酵,2010年~2011年,全国出版产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出版社逐步完成了如明确出资人和出版社权益、清产核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落实人员安置政策等改制流程。这一时期,出版企业实现上市破冰并逐步推进。

尽管难免经历阵痛,但是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的出版机构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进入2010年,出版效益稳步增长、资本化运作成效显著、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出版”“大教育”的格局呼之欲出。出版机构的兼并重组速度加快,既有为扩大出版规模效应的同行业兼并,也有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兼并,如拓展房地产、游戏、动漫等产业。国际合作从版权贸易到资本运作再到本地化经营常态化,中国多次成为重大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版转型升级快速推进,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引进数字出版人才,建立数字出版部门,新闻出版发展重点实验室、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纷纷建立。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资本化、专业化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

经历迅猛的发展期后,近年来出版业开始慢慢沉淀,回归“慢出版”“细出版”。很多出版人意识到,在市场化竞争中,更应该强调出版业的双重效益,“大而全”“快而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出版社通过设立奖项鼓励更多优秀原创内容,通过成立作家工作室为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开设书店更好地服务终端读者,通过国际编辑部这种成本低、风险可控的方式寻求中外合作。相关部门开始对教材教辅出版进行规范,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政治》教材投入使用,其他层级的教材统编措施正在酝酿。

出版正在回归文化服务的初心。

2008~2018 10年新切片

2008年 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落成

2008年,国家首个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落成。基地在成立之初就实行管理主体、运作(服务)主体和企业主体三分离原则,即主管部门对基地依法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张江集团和张江数字多媒体公司是基地的服务主体;基地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机构是基地发展的主体。基地通过引入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上游的相关企业,为其提供覆盖园区配套、政策、金融、技术孵化、市场平台等多个领域支持。这种集群化的新产业孵化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10年间被广泛落地。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园区)研究报告》显示,10年来,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完成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的总体布局,14家数字出版基地陆续在上海、重庆、天津、广东、陕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福建、山东、江西成立。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成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部分。

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不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江西作为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后来者,着力打造数字传媒、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手机应用、人才培训五大产业集群。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重点发展知识内容产品与服务、数字在线教育及培训、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数字影音、网络增值服务、数字出版终端、衍生产品开发八大产业门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集聚效应,更多体现在创新资源集聚与教育资源的集聚。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更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

2009年 国际大型书展主宾国,中国来了!

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这也是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出版交流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引进版权为主,引入输出比最高达到15比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出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借助主宾国平台,中国力求充分展示本国出版物,宣传本国知名作家,扩大

图书版权贸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据悉,在当年,参展的中国内地出版单位达225家,人数超过1000人,展品7600余种,图书总码洋超过87万元。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参展商举办朗读会、签售会、首发式、读者见面会、研讨会等活动,多达600多场。中国作协组织“百名作家团”参加各种活动,与西方读者和专家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此后,中国频繁亮相各大国际书展,如开罗、伦敦、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阿尔及尔等。仅2018年,中国就作为古巴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阿尔及尔书展、哈瓦那国际书展等展会的主宾国,中国在国际出版舞台上绽放光彩。

2011年 教辅“整装”再发

在我国,除了教材,最畅销的图书可能要数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图书了。教辅出版蕴含的巨大商机,使得一大批机构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教辅出版近10年的发展与政府监管规范息息相关。

很多教辅商至今对2011年起开始试行的“教辅新政”记忆犹新。针对中小学教辅材料品种多、质量差,部分出版发行单位违规甚至违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案件时有发生的情况,2011年起,多个部门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教辅专项治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红头文件,这些文件被统称为“教辅新政”。如2011年8月1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印刷复制、发行、质量、材料价格、市场等方面管理;2011年12月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图书出版单位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资质的通知》,明确图书出版单位以中国标准书号出版教辅材料,严格实行资质管理,必须具备专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编辑机构、学科出版业务能力

力,并须报原总署审批。

最为关键的文件是,2012年2月8日,教育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4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组织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各地市教材委员会“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同时规定:“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习册,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教辅授权和教辅评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3年秋,大部分教材社迅速完成了系统教辅的授权。

“教辅新政”从短期来看,对教辅生产企业和分销企业、零售企业都产生巨大影响,产业链受到明显冲击,市场规模大幅缩小,许多企业生存维艰,逐步退出市场。从长期来看,对教辅产业的规范治理,提高了教辅质量,也驱除了盘旋在学校上空的嘈杂之音。当然,新政的出台和实施推行是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教辅读物的出版发行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年 热门大奖“带货”可观

2012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时在瑞典文学院揭晓,莫言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作家,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在当晚,国内签下莫言作品全版权的北京经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典博维)陷入一片忙乱当中,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打电话来要求加印和合作。获奖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图书销量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这种效果在获奖当天就显现出来,很多电商卖断货,要求加印。莫言作品延伸版权的价格大幅上涨,由莫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成绩也非常可观。甚至与出版传媒相关的股价都大幅提升。各家出版社想尽各种方法,推出了更多莫言创作或者由其参与的图书及相关产品。这种

现象在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也同样出现,曹文轩作品销售实现了飙升,与曹文轩相关的图书策划也在加速推进。直到现在,“莫言风”“曹文轩热”仍未过去。

不止国际大奖,国内知名奖项所推荐的名家、名作带来的商业效应都极为明显。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等。当然,这种商业效应的产生与出版机构的借势营销能力极为相关。通常只有几家营销运作能力较强的机构能够抢得先机,并将商业效应不断延续,能否在第一时间将作家、作品的亮点进行挖掘,以最快的速度让读者所熟知考验着出版机构的运作能力。



#图书稿酬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基本稿酬制度。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提供了3种可选择的稿酬方式,即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以及一次性稿酬,这3种方式现在依然沿用。

#出版人才成为高校培养目标# 自从1983年4月1日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国有100多所综合性和专门性院校先后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

#书号规范与国际接轨# 中国于1982年加入国际ISBN组织,获得组号“7”。2007年1月1日,历经4年修订的第4版《国际标准书号(ISBN)》GB/T5795-2006正式实施,中国标准书号的位数由原来的10位上升为13位。

#中文排版迎来光与电# 在历史上,印刷是典型的传统型产业。1980年9月15日,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了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1985年新华社率先使用,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了“光与电”时代。

#科技书出版难引起关注# 科技专著出版难,一直是困扰出版界的一大难题。1988年6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在全国率先设立“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此后10年,全国有20余个专项科技出版基金、10余个包括资助科技著作出版在内的综合性图书出版基金。

#百万出版业精英齐聚# 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市场的开放,让印刷精美的挂历一度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逐步使用,挂历在1990年代末期走向衰落,市场上挂历销售旺季一年来得比一年晚,销售周期一年比一年短,近年几乎绝迹。

#中国加入版权公约# 1992年10月,我国同时被接纳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意味着中国版权市场真正与世界接轨,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书业三大年度盛会渐成气候# 1987年,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会联合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1988年,为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会”。1986年9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举办了第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此后每2年举办1届。随着中外版权贸易的迅速增长,从2003年开始BIBF改为每年举办1届。1980年10月,第1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举行。1989年第2届全国书市相隔多年再次举行,市场反映良好,促使全国书市之后开始形成1年1届。2007年又正式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合资出版社出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资出版社出现,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等都是典型代表。

#持证上岗制度开始实施# 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业刚刚恢复,仍沿用多年习惯,以事业单位体制选人用人。后来自人事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行业持证上岗”制度实施,书业有了用人规范。

#出版社联合体出现# 1988年,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以全国地方文艺出版联合体的名义开展系列活动,此后,各种出版类型,如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京版九联、社科十联等相继成立,抱团取暖之势更加坚固。

#老字号出版社延续中断历史# “文革”之后,一批老字号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1979年8月,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三联书店也于1986年1月恢复独立建制,很快,这些出版社依据其原有资源及编辑出版上的优势,推出大批优秀图书,并很快成为书业的中坚力量。

#书业效仿贝塔斯曼会员制# 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并于1997年将风行全球的贝塔斯曼书友会的经营理念带入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到2000年前后,经过人事经营思路方面的变动,加上网络书店兴起,贝塔斯曼表现出水土不服,一直在走下坡路。2008年6月,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下转第11版)

